

1060亿元,2012年为1116亿元,达到香港债券市场年度融资总规模的1/3。

(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是落实中央政府“惠港”政策的现实要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香港外部环境恶化,经济金融面临严峻挑战,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多项“惠港”措施,涵盖金融、经贸、教育等方面,支持了香港繁荣与稳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也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2011年8月,中央政府明确,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并逐步扩大发行规模。

(三)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是发挥其区位优势的现实要求。发展境外人民币国债,客观上需要一个“既贴近内地、又贴近国际”的离岸市场。香港“背靠大陆,辐射全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一端联系内地,是内地最大的转口贸易平台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地区,另一端通达国际,是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法律体制和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三、从实践的过程看,稳步推进是人民币国债走出去的必然要求

人民币国债“走出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结合经济金融环境和债券市场发展需求稳步推进。自2009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以来,财政部遵循“稳健务实、适度探索、尊重市场、关注民生”四项原则,稳妥有序地开展人民币国债发行工作。

(一)遵循“稳健务实”的原则,逐步拓展人民币国债发行的深度和广度。适应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投资需求,财政部稳步扩大了发行规模。2009—2011年分别发行了60亿元、80亿元和200亿元人民币国债,2012年进一步扩大至230亿元。同时,为了构建完整的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2009—2011年,财政部发行了2年、3年、5年、7年和10年期市场主要期限品种,2012年还发行了15年期国债。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稳步增加,期限品种日益丰富,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基准作用。

(二)遵循“适度探索”的原则,逐步完善人民币国债的发行机制。2009年,财政部按照市场惯例,采用簿记建档方式发行人民币国债,2010年,在继续沿用簿记建档方式的基础上,率先尝试通过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债券投标平台直接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国债。2012年,财政部继续通过CMU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155亿元人民币国债,并按照CMU招标价格向国外中央银行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同时,人民币国债实现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三)遵循“尊重市场”的原则,吸引各类市场投资主体积极参与。为了吸引广大投资者积极认购人民币国债,财政部开展了“多渠道、全方位、广覆盖”的宣传,2009—2011年,每年都举行推介会,增进投资者的认识和了解,每年都举行发行仪式,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同时,在广告和软文的投放上进行了“立体式”的宣传。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人民币国债吸引了广泛的市场参与主体。2012年,财政部举行“人

民币国债走出去与香港债券市场发展”专题研讨会,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人民币国债的发展前景,并隆重举行了发行仪式。

(四)遵循“关注民生”的原则,关切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为了使更多的香港居民有机会参与投资,分享祖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每年财政部专门预留一定发行额度对个人投资者定向发行,2009—2011年分别为50亿元、30亿元和50亿元,2012年发行规模为55亿元。同时,充分考虑香港居民的投资偏好,在期限品种上做了相应的安排。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我国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知识合作迈上新台阶

国际金融组织既是中国获取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和理念的窗口,也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交流发展理念的平台。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下分别简称世行、亚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合作,借鉴先行国家成功发展经验和政策措施,为我国推进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制定提供深度政策参考和培养人才队伍,是“十二五”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和重要抓手之一。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也不断丰富着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理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知识合作模式也由传统的单向“引进”开始转向更为活跃的双向交流和对南南合作的共同支持。

财政部作为世行、亚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在华窗口部门,在推进和创新与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知识合作方面责无旁贷,任务重大。近年来,财政部积极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在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合作的历程与成效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相继恢复世行席位、加入亚行,30多年来,我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资金合作的同时,也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和多形式的知识合作。除了贷款项目中所包含的有关政策研究课题外,知识合作更多的以技术援助、经济合作调研、政策咨询建议等形式进行,覆盖了长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交通、农业、能源、城建、环境、工业、教育、卫生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合作30多年来,作为知识合作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世行针对我国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企业改革、投资环境、知识经济、农村发展、扶贫开发、教育卫生、交通运输、能源水利、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领域开展了上百项专题调研,编撰了近200篇调研报告。另外,还与世行合作召开了不同形式、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大量研讨会,为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近年来,与亚行的知识合作也有了大的发展,尤其是自2008年起双方合作制订了“知识产品与服务规划”(KPS),有计划

地开展有关政策调研与知识合作活动,重点支持战略性、政策性、前瞻性较强的课题研究。

在以支持政策研究、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以及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援助方面,更是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截至2012年底,世行累计向中国提供了约4亿美元的贷、赠款,支持实施了14个独立的技术援助项目。此外,还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赠款,支持了上千个赠款项目,其中大部分是技术援助类项目。20多年来,亚行累计向中国提供了约4.03亿美元的赠款,用于支持约704个技术援助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与世、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对外开展的知识合作也在不断完善和纵深推进。近年来,中国与世行合作先后举办了“上海全球扶贫大会”、5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与亚行合作举办了4届“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高级研讨会,与国际农发基金合作举办了4届“中国与农发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等许多重要的多边交流活动,接待了发展中国家的多个发展经验考察团,面向发展中国家举办了多领域的培训班,在促进南南知识交流与合作,实现全球减贫与发展目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合作对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完善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专业化、国际化的政府管理人才和专家队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合作成果已转化为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并付诸于实施。同时,联合世、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合作也有效地宣传了我国发展经验和理念,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为今后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创造了环境。

二、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合作的主要情况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智力资源,共同开展综合性、战略性的联合研究。2010年9月,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访华期间向我国国家领导人建议,由世行和中方合作开展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研究,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回应。经过双方专家1年多的努力,这项研究于2012年结题,形成了《2030年的中国》报告。报告共分六大部分,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未来20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各有关部门、中外学术界以及不少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世行网站历史上下载量最大的报告。该课题研究成为中国与世行知识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2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行新任行长金墉时,提议中方愿与世行就城镇化开展联合研究。金墉当即表示赞同,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将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宝贵经验,世行将安排最优秀的团队与中方共同开展该研究。为落实领导人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作为中方牵头单位联合启动了以“推进高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城镇化”为主题的研究相关工作,具体包括:城镇化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城镇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包容性城市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土

地改革制度;城镇化与保障粮食安全;城镇化与低碳绿色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融资。这项研究对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探索中国式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为部分地方参与世行知识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方将与世行共同合作,将这一研究做成双方合作的又一旗舰项目。

(二)开拓创新,与国际金融组织建立新的合作平台机制。

1.与世行签署成立“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谅解备忘录。2012年,金墉就任世行行长后,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发展经验和案例研究,提议世行建立“案例库”,将其作为培训世行员工和全球发展实践者的资源,促进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交流。为了落实金墉的施政理念,世行计划首先在亚、非、拉三大洲各选一个试点国家,建立发展实践知识中心,帮助各国找到解决各自发展问题的最佳方案。在试点的基础上,世行还将帮助更多国家建立发展实践知识中心,并形成“全球发展实践知识网络”,推动各国相互学习和借鉴发展经验。2012年11月27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与世行行长金墉在京签署了建立“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谅解备忘录。该中心成为世行首批在全球成立的3个发展实践知识中心试点之一,其宗旨是立足发展实践、共享发展经验。主要任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研究中国发展瓶颈问题,提出高质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系统性地研究总结中国的发展实践经验,并向国际社会推介,同时推动国内经验交流。

2.推动亚行区域知识共享中心(RKSI)正式组建并投入运作。该中心由中国和亚行联合倡议发起,经多方积极筹备,于2012年8月3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RKSI将重点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下的政策对话、知识交流和业务培训,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能力建设服务。RKSI成立后,将更有效地对内整合我国与亚行知识共享合作相关活动和工作,对外整合亚行的资金和智力资源,进一步探索新时期我国与亚行南南知识合作的新模式,打造我国与亚行合作的新品牌。

上述两个中心的建立,将为中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促进“国际经验中国化、中国经验国际化、国内经验交流网络化”提供有力抓手。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优势,积极开展技援合作,推进国内体制机制创新和能力建设。

1.利用世行、亚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资金开展技援项目。2012年,在世行技援五期(TCC5)项目下,新批准了4个子项目,金额达170万美元,内容涉及社会保障、农业保险、少数民族发展、卫生医疗改革等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课题;获得亚行批准的技援赠款项目共25个,金额达1425万美元,重点支持生态环境、低碳经济、交通发展、金融改革等。财政部设计提出了利用世行贷款开展第六期技援项目(TCC6)的建议,并成功列入2014年利用世行贷款规划。另外,还继续积极争取和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技援资金,支持开展有关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及教育财政改革与制度开发等。不少技援项目由省、

市级地方政府部门实施,直接为地方改革发展献计献策。

2. 与世行开展合作经济调研(AAA)项目。合作经济调研是我国与世行开展知识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通常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发展和机制体制创新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分析与建议。2012年,财政部在总结历年与世行开展合作经济调研项目经验的基础上,与世行就调研项目申报、资金使用、合作方式、成果发布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和必要改进,使AAA项目更具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和时效性。2012年共同确定了15个调研课题,涉及金融改革、农产品质量安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学前教育等领域。同时,2012年,世行和有关部门完成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与农业的影响、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等多项AAA项目,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相关领域发展的有效建议。

(四) 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推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南南知识合作。

1. 2012年11月,与世行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成功举办第五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中小企业融资与包容性增长”为主题,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马拉维、马来西亚、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7个国家的11名高级官员(包括5名副部级官员),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专家,以及来自国内有关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的代表共约60人出席了会议。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研讨会围绕“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与包容性增长”、“为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促进包容性增长创造良好环境”、“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别经验”、“中小企业融资创新”、“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合作”5个具体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外方代表还赴安徽省对中国的微小金融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研讨会加强了我国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的经验交流与分享,强化了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的南南知识合作平台定位。

2. 2012年9月,第一次在境外与亚行联合举办第四届“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高级研讨会。这是我国与亚行发起成立区域知识共享中心后开展的首次大型南南知识共享活动。来自中国、孟加拉国、日本、泰国、马尔代夫、亚美尼亚、斐济、越南、缅甸、老挝、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印度等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5名副部级代表,以及亚行、泛美开发银行、日本协力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家和学者近100人参会。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亚行行长黑田东彦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研讨会就各国在南南知识合作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在全球范围深入推动南南知识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南南知识合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和探讨。研讨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相互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分享,探讨了未来的合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3. 2012年5月,与世行学院联合举办“亚太地区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来自世行、亚行、全球研究联盟等国际机构及全球13个国家的约10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和模式、基层创新的推进和传播、有利于推动包容性创新的政策环境、有关国家的包容性创新实践等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交流。

4. 2012年7月,与国际农发基金在北京和山西共同举办第四届南南合作研讨班。来自国际农发基金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巴基斯坦等12个发展中国家的约30名代表应邀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小规模农业发展与减贫”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并赴山西省晋中市实地考察了新农村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市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推广及职业教育培训情况。研讨班有效宣传了我国减贫事业成就,加强了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经验交流和共享。

三、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知识合作迎来新机遇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需要继续深入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需要加快解决,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机构能力问题需要大力完善加强。同时,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新发展、新跨越,也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此外,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各级政府将更为直接地面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压力和困难前所未有。面对这些形势,加强知识合作,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为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我国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知识合作也迎来一些新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国内开展知识合作都有强烈的愿望。国际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在国内,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目标,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和推动相关改革的布局和方案。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双向需求,将为我国与国际金融组织深化知识合作提供直接动力。二是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对加强知识合作有高度共识。财政部在与世行、亚行共同制定合作战略时,均将知识合作作为优先领域。世行行长金墉认为中国是解决发展问题成功范例最多的国家,中国经验值得世行认真总结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前亚行行长黑田东彦每年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并亲自参加中国主办的南南知识交流活动。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将成为进一步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三是地方参与知识合作有良好基础。近年来,各地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知识资源,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很好地服务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当地的高度重视。同时,各地在实施具体项目时,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需要进行总结、提炼,从而形

成生动的案例,借助国际金融组织知识平台走出本省、走进全国、走向世界。

面对机遇与挑战,“十二五”时期,财政部将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改革创新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合作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知识合作,有效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智力资源,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按照“出战略、出政策、出方案、出机制”的“四出”原则,加强对具有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和示范性意义问题的研究,提高知识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王莹执笔)

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2012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严峻复杂。欧债危机反复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频繁,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缺乏内生动力,增长继续呈低迷态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各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取向分化加剧,政策协调难度上升。在此背景下,财政部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等全球性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机制,以服务我国领导人出席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为主线,推动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努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积极引导G20宏观经济政策讨论,推动制定全面平衡的“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

在全球金融风险仍然较大、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的大背景下,在G20戛纳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也是G20洛斯卡沃斯峰会的一项主要成果。各方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应对欧债危机等全球短期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同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各方期待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和汇率政策透明度,允许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在全球经济恶化时采取更多财政刺激措施,明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的具体金额,加快推进利率自由化和要素价格改革等。

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积极推动各方将促进复苏、增长和就业作为洛斯卡沃斯峰会的首要任务,强调各国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共同采取有力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同时强调发达国家应努力减少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对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在我国积极参与下,洛斯卡沃斯行动计划就欧债危机、财政整顿等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并宣布了G20新的国别政策措施。其中,欧元区将考虑采取切实步骤推进涵盖银行监管、处置、增加资本金和存款保险的更加一体化的金融构架,完善经济和货币联盟,并通过结构

改革推进欧元区内部调整;美国同意调整财政整顿的步伐,避免在2013年税收优惠措施同时到期和自动支出削减计划启动导致的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发达经济体承诺通过实施可靠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实现多伦多宣言提出的中期目标。G20各国还承诺尽量减少国内政策实施对其他国家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并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化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有负面影响。此外,行动计划还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对此所作贡献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在人民币汇率、自动财政稳定器作用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等问题上较为平衡地反映了我方主张。

二、深入参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工作,推动形成全面平衡的问责评估框架

按照2011年戛纳峰会共识,G20成员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以下简称增长框架)下重点就以往峰会政策承诺的落实情况开展了问责评估。我国积极参与与设计问责评估的基本框架,坚持在成员国主导的原则下对各方落实历次峰会政策承诺进展进行全面、平衡的评估,并积极呼吁开展建设性对话,增进对彼此国情和风险挑战的理解,加强政策对话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

经过反复讨论,G20增长框架工作组基本吸收了我方有关建议,同意就峰会承诺涉及的所有领域进展情况,而不仅限于财政、货币和汇率领域的政策承诺,形成了较为全面、平衡的问责评估框架。在此基础上,G20成员于2012年上半年提交了各自的国别政策模板和经济预测数据,并据此先后开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互评和对以往峰会政策承诺落实进展的监督问责工作,起草了G20首份问责评估报告。我方按照工作组联合主席要求,及时对政策框架模板进行合并完善并迅速反馈,体现了我方积极参与互评工作的建设性姿态。我方还积极参与工作组讨论,充分阐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和在落实以往峰会政策承诺方面的进展。针对各方关注的全球再平衡问题,我方重点介绍了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基本情况,并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效增进了各方对我国为促进外部平衡所做努力的认识,并使之在问责评估报告中得到平衡反映。

三、推动G20应对欧债危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2012年上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大。我国积极推动G20成员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对外释放G20携手应对危机的积极信号,以稳定市场信心。为增强IMF应对危机的能力,2012年4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做出承诺,有关国家将为IMF提供4300亿美元以上的额外资源。2012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G20洛斯卡沃斯峰会时宣布,向IMF提供资金430亿美元,增强其应对危机的资金能力,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2012年7月,G20以财长和央行行长名义发表简短联合声明,对6月底欧盟峰会提出的应对危机措施表示欢迎和支持。此外,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还与欧元区主要经济体